



军政往事





大山深处飞出跨世纪的歌

邱鸿伟*

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为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传承和弘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光荣革命传统,来自各地各行各业的党员干部群众纷纷来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红歌词曲诞生地——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参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和中堂庙厢房词曲创作地旧址,或在纪念馆对面山梁上面积达 960 平方米的“全国最大党旗”下的广场唱响红歌,或举拳重温入党誓词,或围坐在词曲创作地旁的百年老核桃树下聆听老党员讲述几十年前人们传唱红歌的点滴故事……尽情抒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之情,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霞云岭堂上村坐落在海拔 2160 余米的百花山主峰山腰,距北京城区 130 公里。78 年前,在这个村中堂庙的厢房里诞生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令人激昂振奋、反映全国

* 邱鸿伟:房山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二级调研员



人民心声、至今久传不衰的力作。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第六个年头。这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狂妄叫嚣“没有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同时污蔑八路军和新四军及敌后游击队“游而不击”是“变相军阀”。这些言论激起了解放区军民极大的愤慨。7月下旬，中共中央印发了《评中国之命运》的刊物，8月，延安《解放日报》也及时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举大量铁的事实，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无耻的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的回击，并鲜明指出，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流砥柱。

与此同时，为配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晋察冀边区抗联群众剧社组成若干小分队深入敌后根据地，动员群众坚持抗日、坚定群众的抗日决心、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广泛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43年9、10月间，年仅19岁的曹火星随40多人的群众剧社小分队跋山涉水深入平西抗日根据地霞云岭堂上村进行创作，具体任务是组织文艺创作、排戏和演出、书写抗日标语。当时，平西一带非常流行以边舞边唱、节奏明快的“霸王鞭”形式表演文艺节目，这种形式让创作人员眼前一亮，也深深影响了曹火星。受此启发，剧社借用“霸王鞭”的民歌曲调填新词，用“霸王鞭”的表现形式在根据地进行各种宣传



活动。剧社的同志还在很短的时间内，一连创作了几首宣传党的抗日民主主张、批驳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歌曲。后来，考虑需要有一首既能概括前几首歌内容，且曲调明快有力、提振精神的主题歌。剧社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曹火星。

曹火星 1924 年 10 月出生于河北平山县。1938 年上半年，他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走上革命道路。作为一名爱国知识青年，曹火星在血与火的革命征途上，目睹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身而出，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拯民族于危难的壮举，心里充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崇敬之情，心底深深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恨的种子。特别是他到了晋察冀边区后，被当地群众热爱还好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感情和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所感染。

曹火星接受创作革命歌曲主题歌的任务后，心潮澎湃，《解放日报》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个极富号召力、凝聚力的观点激发出他强烈的创作欲望。1943 年 10 月的一天，他在堂上村中堂庙厢房的土炕上盘腿而坐、与一盏小油灯做伴熬眼，只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激励和鼓舞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日的革命歌曲就被他满怀激情地跃然纸上。歌曲写成后，经过后来的反复斟酌修改，曹火星等人在根据地以“霸王鞭”的表演形式先教村里的儿童团员们学唱，儿童团员学会后，再教村里的其他群



众唱。这样，一传俩、俩传仨、仨再传给大家，这首歌很快就在当地流传开来，迅即唱遍了堂上这个小山村、唱到了晋察冀边区、唱响了华北，并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步伐传唱到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一首脍炙人口、鼓舞斗志、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革命红歌。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中南海院子里听到女儿哼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时，立即给她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在“中国”前面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才更准确。自那时起，这首红色经典旋律一直传唱至今。

1991年，适逢建党70周年，年已古稀的曹火星在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支持下，酝酿拍摄专题片《跨世纪的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年9月，天津音协的同志带着摄制组，驱车来到霞云岭乡堂上村的中堂庙旧址，采访了当年的儿童团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首唱者，已是花甲之年的李福会、李增生、李万森等老人，详尽回顾了解了当年他们与曹火星等人教唱、排练“霸王鞭”的情景。

1994年8月15日，曹火星在有关人员陪同下，亲赴阔别50多年的堂上村实地考察，在他进行词曲创作的中堂庙厢房旧址前和李福会等老党员促膝交谈，满怀深情的回忆当年的情景，不尽感慨万分。9月24日，天津市文艺界负责人、原群众剧社的同志和天津市音乐工作者40多人，与曹火星一起再次来到堂上村参加了词曲创作记事碑的揭幕仪式。



2000年，为庆祝建党80周年，房山区筹划组织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区委区政府在堂上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诞生地创建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建成了纪念雕塑。并于6月27日，举行了雕塑揭幕仪式。北京市委主要领导、曹火星的女儿曹红怡、房山区委的领导以及堂上村党支部书记共同为通高5米的纪念雕塑揭幕。当绛红色大理石基座上那金灿灿的“地球”和矗立在地球之上的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雕塑展现在人们眼前时，现场响起经久不息、雷鸣般的掌声。为了让人们更多更好的了解堂上村的抗战史和革命红歌词曲创作的过程，2006年6月26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在堂上村落成，同时隆重举行了大型主题展览开幕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这首亿万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歌曲伴随着“霸王鞭”的铿锵节奏在他的诞生地上空久久回荡、飘向远方。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房山区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诞生地特别制作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标志柱和巨幅“党旗”。标志柱高19.21米，直径2.8米，金属结构，上面书有江泽民同志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金色大字，寓意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以来，历经28年的奋斗历程解放了全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擎天柱。巨幅“党旗”采用大型金属结构建造，面积960平方米，寓意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鲜红的“党旗”依山就势“飘展”在高高的山梁上，金色的党徽鲜艳夺目，与《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纪念馆遥相呼应，成为首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进程中鲜明的红色符号。近年来，纪念馆旁的平台上又新增了数尊领袖人物和战士的塑像，他们面向“党旗”，迈着坚毅的步伐，自信地走向未来。

作为“北京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革命传统教育胜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诞生地，每年都吸引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们踏访。2011年，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等14个部、委、局联合下发文件，确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二批名录》。



史家营乡抗战历史纪事

任正通*

暴风雨来临的前奏

史家营地区，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是一个非常偏僻闭塞的深山地区。自古以来，除了有过一两次二毛（信奉外教的假洋鬼子）捣乱外，老百姓一直过着艰苦而安宁的生活。也可以说：“山中无甲子，寒岁不知年。”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的秋天，人们的视线中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情景。山里忽然来了大军，身穿黄军装，一队接一队，来了就不走了。金鸡台村、青土涧村、西岳台村……几乎所有的大村子都驻上了军队。

他们圈场地、搭锅灶、扎马圈。还让村里的老百姓给他们干活，上山拾柴火，到煤窑背煤块，帮他们生火做饭，割草喂马。老百姓不明白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到底要住多长时间。他们操着山外口音，语气很是蛮横，而且他们人人手里有枪。

* 任正通：房山区政协原副调研员



望着冰冷的枪支，黑洞洞的枪口，可是疼人哪！前面还有闪亮的刺刀，老百姓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啊。现在逃跑是来不及了，再说，拖儿带女，一时往哪里跑呀。不给他们干活也不行。

其实，这是在日本鬼子占领了宛平城后，一路开向山西方向，预谋攻占我山西能源大省，掠夺那里丰富的煤炭资源。为了阻止日寇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卫立煌的 85 师，从此经过，准备在髫髻山打击日本鬼子以配合汤恩伯防守南口的战役。

卫立煌的部队内有不少新入伍的学生兵，他们需要起码的短期训练。所以在路过四区这一带的时候，短暂驻留了几天。

老百姓只看见穿黄军装的士兵们在刚割完庄稼的地里训练了几天，就排成队伍过了东安岭，朝山那边去了。

卫立煌的部队过东安岭、南港沟到千军台、大寒岭一线，在髫髻山和日本鬼子遭遇，激战了 20 多天，双方伤亡很大。后因汤恩伯的部队顶不住日军的强烈进攻。于 8 月 26 日开始陆续撤出阵地，南口、居庸关陆续失守，完全被日寇占领了。

国民党军队走了不到一个月，又沿着去时的路回来了。在金鸡台简短修整后，就出村往下撤走了。老百姓看见军队里有大量的伤兵，有的头上缠着绷带，有人拄着拐棍或拄着抢一瘸一拐地往下走。

据健在的 83 岁的董永和老人回忆：“国民党军队与鬼子激战过后，像潮水般退了下来。一部沿月牙山到宝地洼经过大安山村、西苑村过东安岭到达金鸡台村，再往南撤。遍地都是国民党军队的败兵。他们抓夫赶牲口驮运枪炮子弹，赶走金鸡



台村骡子 35 头，毛驴 30 头。金鸡台村董春波被抓走后至今无音讯（已经过了 70 年）。该人是董春霖的堂兄。我大伯董春耕让我父亲董春良和我大哥董永贤去柳行地拾核桃时被国民党军队抓住，一人背两箱子弹到高铺村。夜间趁官兵露宿熟睡，我伯父和大哥才得以逃跑回村。”

根据离金鸡台村 30 华里的柳林水村老人回忆：“真是人上万，无边无岸。道上走的队伍看不到头。国民党军队走了两天才过完，后边的伤兵还在柳林水村住了一夜。他们抓村里的鸡，宰村里的猪，让老百姓苦不堪言。”

国民党军队组织的这次战役地点虽然不在史家营地区，但是这一进一退，从史家营地区路过，却让山里人第一次见识了当兵的模样，而且还领教了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的态度。

国民党军队撤走后，中国共产党派遣大批的干部到平西山区开展工作，为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老区军民抗击日寇渡难关

1939 年冬，日寇向金鸡台及临近山村进攻扫荡。日寇高官多田带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杀光：见一人杀一人，抓住了金鸡台村年老体弱的村民 8 人，时至今日，墙壁上仍有熏黑的痕迹。日寇抓住讨饭的乞丐、长操村 14 岁的魏永，他们用刺刀将他挑死在村北头麻籽场桃



树下，惨不忍睹。

烧光：日本鬼子所到之处，抓不住人，就烧房。就连庙会用的彩旗和旗杆也绝不留下，全部点火烧掉。

抢光：把村里老百姓有用的东西都抢光，还把村里戏班子的行头和大鼓乐器全部抢走；只要抓住村里的各种牲畜，一头不留，全部赶走。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百姓们生活什么都缺，敌占区有危险不能去，只能从边区去大后方托人买些急需的物品。为了抵抗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村民们实行坚壁清野，躲避藏匿。将粮食衣物全部隐藏起来，各家都从村里转移到自家山坡地里盖草铺，挖土铺临时避难。

山沟里隐蔽处的天然岩洞，成了老百姓和八路军重要的隐蔽和休养场所。当年张显然家住在村东南的牛头洞里（天然山洞）。牛头洞也称“神仙洞”，外面口小，里面宽阔而且深不见底。在躲避鬼子期间，也经常有八路军伤员来这里养伤，伤好之后，继续上前线参加战斗。

住草铺的百姓们生活非常艰苦，遇到雨天，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接雨水的铜盆铁盆被漏下的水点砸得叮当叮当响个不停。睡觉的土炕上没有炕席，被褥被日本人抢走了，多数家庭都是一家几个人盖一床破被；没有枕头就枕在炕沿上。草铺里臭虫满墙爬，从墙上掰下一块泥坯，上面仍爬满了臭虫；跳蚤在炕上蹦蹦跳，虱子钻满衣缝，大人小孩满头虱子。

面对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老区军民团结一心，英勇杀敌。



利用游击战、地雷战，不断打击日军的疯狂扫荡，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

1940年，在斋堂镇据点的日军在庙安梁修岗楼堵截交通要塞。洪水峪村17岁的张成会被派去修岗楼，他将一颗炸狼弹暗中装在鬼子工头的大衣兜里，将拉弦挂在大衣里面的钩子上。鬼子工头从工地回来取大衣时，被炸狼弹炸死，一名护卫被炸残。这是张成会在2003年春讲述他当年杀鬼子的故事。

抗战年代宛平县委书记董春勤回到四区金鸡台村走访军属，发现军属董春瑜的老母亲已经困难得揭不开锅了，毫不犹豫地将自家储藏的小米、玉米、豆类拿出来送到了这位老母亲家中。董春勤说：“春瑜哥在前线打日本人，政府应该照顾家中的老人，您和我的老母亲一样，有大家吃的就不能没有您吃的。”这位老太太感动地流下了热泪。

战乱时期，董春勤经常受县委派遣，和县妇救会主任史文通（女）一起，到金鸡台村和村干部董丰聚在一起，通过地下组织关系，到大安山的鬼子据点去摸敌情、探消息，配合锄奸队长于振边除汉奸，策反伪军倒戈。

有一次夜间，游击队侦察员张国立同民兵在大安山村西圈门的岗楼下，抓获了一名日本兵及一名伪军，行进到东安岭时，鬼子激烈反抗，被张国立击毙。日本鬼子听到枪声，前来报复，追到西苑村时，被我埋伏的游击队击退。

抗战年代，老百姓们日夜不得安宁，大安山据点的日伪军及庙安梁岗楼的日军三天两头进攻扫荡。1940年11月7日深夜，



大安山据点的日伪军悄然进村包围了金鸡台村民兵队部，队长谭国忠看到日伪军进了院子，他顺势向鬼子群扔出了 3 枚手榴弹，分队长刘增华趁硝烟弥漫中越过院北墙逃脱，谭国忠被伪军头目大史平开枪打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张玉书当了丰台区公安局局长，在大街上认出了大史平，立即将其抓获，经过审讯后执行枪决。

1941 年冬天的一个夜里，百姓们正在睡觉时，庙安梁驻扎的日军包围了金鸡台西港沟，将游击队长宋守富围堵在屋子里。他顺势向院子里的鬼子甩出了几枚手榴弹，鬼子有死伤，他也被抓住带到了南坡梁。在苍茫的旷野中，鬼子对宋守富进行了严刑拷打，宋守富咬牙没有说出游击队的秘密。12 月 9 日，日本鬼子气急败坏地将宋守富杀害。宛平县立东斋堂烈士碑上有这个英雄的名字。他父亲宋德义被誉为光荣烈属称号。

在反击日伪军扫荡过程中，游击队在北坡梁伏击战中，打死打伤日伪军数人。东安岭八路军七团与鬼子的遭遇战中，我官兵奋勇杀敌，鬼子死伤大半后仓皇逃回据点。八路军七团在大堰台埋伏战中，击败鬼子的进攻，日军死伤若干。游击队在曹家坊村和鬼子的战斗中，从曹家坊村突围到史家营村的陈家坟继续与鬼子交战。司务长董春发、村民宋连巨因搬运炊事用具牺牲在山地里，日军也有伤亡。柴头安梁的手榴弹迫击战，东大台、西大台、刘家坟尖、大簸箕洼的还击战等都取得了胜利，日军都有不小的伤亡。

通过与日伪军的交战，我八路军和游击队缴获了大量的枪



支弹药等战利品。游击队长董春瑜在战斗中吐血牺牲。二任队长张广德，民兵张成龙、张成广，游击队侦察员张国立，民兵队长张国勋也在战斗中为国捐躯。

平西人民坚持 8 年抗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金鸡台村在抗日战场上牺牲及被日伪军残杀的人民群众就达 41 人。

新中国成立后，金鸡台党支部和村委会，带领村民在东安岭下平趟子处修建了烈士陵园，为烈士立了纪念碑。每年清明节，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去扫墓，缅怀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的先烈。

（讲述人：董永和，门头沟区琉璃渠小学原书记、校长）

除掉汉奸张明太

老百姓有句话，没有家贼，招不来外鬼。日本鬼子扫荡金鸡台肯定有人告密和带路。要不怎么八路军刚撤走，就来进行袭击？

游击队长董春瑜带着几个队员，在村里进行调查。看谁家前几天有从大安山那边来的人。很快，查清了带路的汉奸是西苑村叫张明太的人。人们都知道他投降了日本，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干坏事。

游击队长董春瑜派张治珍去摸清张明太什么时候在家，想办法把这个汉奸除掉。张治珍接受任务后，为了以防万一，把媳妇和刚出生的女儿安置到了村子东南方向的五龙沟里一个山



洞里，自己只身前去探听张明太的下落。临走时，董春瑜给了张治珍一颗手榴弹，让他以防万一。

张治珍在大安山也有亲戚，而且知道张明太的家住在哪里。正中午的时候，张治珍来到了张明太家门口外敲门。张明太此时从大安山岗楼回来，正在歇晌，听见有人敲门：“谁呀？”心虚的他赶紧抓起盒子枪，来到了院里。

“我，张治珍。”听见了回话，张明太把大门一开，就用手里的枪对准了张治珍说：“你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游击队派你来的？”张治珍不慌不忙地说：“我只是路过你家找口水喝。”张明太依然不放心，上前用枪顶住了张治珍的脑门：“说实话，要不然我手里的枪可不认人。”

张治珍不慌不忙，把揣在衣襟里的手抽出来：“你看看我手里是什么？”张明太低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张治珍手里攥着一颗手榴弹，拉线环就套在手指上。张治珍冲他说：“看清了吗？我一松手咱俩谁也活不了。”张明太胆小了：“你上我这儿干吗带着手榴弹？”话音中已经带着胆怯。“我带手榴弹是防身用的，你不知道？这年头，走山道经常遇到狼群，不防着点哪行？”

因为张治珍从小就认识张明太，而且从来都没怕过他。此时没有鬼子在跟前撑腰，张明太狗仗人势的劲头一下全无。“那你说，找我到底干什么？”张治珍说：“我是来告诉你，八路军又回来了，强占了我家的房子。没办法，我是来让你告诉皇军替我家出气的。”其实，张治珍恨不得马上就用手榴弹炸死他。



可是，他清楚，就这样炸死张明太自己也危险，不能这样蛮干。

张明太问：“你知道有多少人？”“多少人我不知道，就知道住我家的那个当官的，大家都管他叫连长。”张治珍回应道。

张明太感觉张治珍说的有可能是实话。但是狡猾的他还是留了一手：“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去报告太君。”“我是偷偷跑出来的，现在还敢回去吗？咱俩一起去见太君吧。”真没想到张治珍有这么大的胆子，反而把张明太给镇住了。

此时张明太在想：“这个人以前我就欺负不过他。现在我领他去见太君，说不定他以后还会找我麻烦。”“要不这样，你先到别的村去躲几天，等这次行动结束了我再带你去见太君。”张治珍看出了张明太的心计。看来，这个汉奸不好对付。

张治珍绕道回到了金鸡台，向董春瑜汇报情况。董春瑜马上和县锄奸队取得了联系，做好了除掉张明太的准备。

时间到了黑夜，天上飘着薄薄的云彩，崎岖的山路非常难走。张明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这边走，他是想先摸清金鸡台八路军的情况，再报告给皇军。如果情报不准，皇军也会惩罚自己。到了山梁上，只能看见半个村庄，因为前面山脚下还有一道小山梁挡住了视线，得再往前走，才能看见金鸡台全村。

张明太正摸索着往前走。“扑通”一跤摔在了山道上。“他妈的，敢让队长我……”“别动！”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了他的后脑勺上。张明太顿时魂飞魄散：“是山神爷还是八路老爷？求求你们别杀我！”锄奸队长于振边用枪顶住张明太脑袋时，董春瑜和张广仁迅速地把他的双手和腿绑了起来。张广仁



力气大，像抓小鸡一样把张明太提了起来。“说！上次袭击金鸡台是不是你带的路？”董春瑜厉声喝问。“不是我……”“别跟他废话了，队长开枪吧。除了这个祸害狗汉奸。”张广仁等不及了。“我说，我说，我也是被迫不得已……”

张明太说出了扫荡金鸡台的经过。

原来鬼子是想袭击住在村里的八路军，没想到八路军已经提前开走了。为了不惊动鬼子，董春瑜一刀刺进了汉奸张明太的后背，这个血债累累的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几个人把准备好的一块白布铺在了用张明太的后背上。用张明太的血写上了“日本鬼子敢侵犯金鸡台，跟这个汉奸一样下场！”

除掉了张明太，震慑了想当汉奸的人。从此汉奸卖国贼不敢带路，鬼子大半年没敢到金鸡台来扫荡，此举为四区的政权建设和抗战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讲述人：张玉民）

省下这颗子弹打鬼子

金鸡台惨案发生后，村里的年轻人董春兰（男）18岁。正好够当兵的年龄。他和其他的同乡到了冀热察挺进军第7团，当了一名八路军战士。在频繁的战斗中，董春兰利用短暂的修整时间回家来看望父母。

这是1941年的冬天，刮着凛冽的北风。到了晚上，外面



冻得伸不出手，屋里冷得难以入睡。那鬼年头，人们倒是不怕迷信中的鬼，而现实中的日本鬼子最是可恨，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只要落到鬼子手里，活着回来的人极少。而村里人，只要有会，也决不给日本鬼子留活路。

董春兰和家里人围坐在炉火旁一边取暖，一边说着在部队打鬼子的情况：“鬼子装备精良，不能和他们硬拼。我们八路军根据毛主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只要开打，就必然要取得胜利。除非偶然遭遇……”刚说到这里，“呜呜——”，门外传来一阵狼的嚎叫声。是狼，人们常说，狼随战争走。以前村外基本见不到狼。但是，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山上狼也多了起来，山这边有狼叫，立即就会招来山那边的狼叫。狂风再加上狼嚎，使夜间的气氛更加恐怖。

狼叫唤的声音很近，听起来好像就在门外。董春兰顺手拿起门后的火把，放在炉火上点着了，猛地开门冲了出去。光亮中看见一头狼正在门外墙沿上伸着脖子嚎叫。董春兰举着火把冲过去。狼没防备，在火把捅过来的一瞬间，纵身跃起，朝黑暗的墙外窜了出去，然后消失在了茫茫黑夜中。再次听到狼叫时，已经是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声音。

董春兰熄灭火把，进门放好。娘问：“狼呢？”董春兰回道：“赶跑了。”

“你身上背着枪，干吗不把它打死？”娘问。

董春兰说：“省下一颗子弹，留着打鬼子！”

董春兰回到了部队，因为物资匮乏，弹药更是不足。在与



鬼子的战斗中，董春兰从来都是瞄准了再射击，弹无虚发。“我的每一颗子弹要消灭一个仇敌。”

1942年，在攻打坨里的一次战斗中，董春兰瞄准稍慢了一步，被鬼子的枪弹打中，不幸光荣地牺牲在战场上。

（讲述人：张文利）

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

金鸡台村过去每年阴历五月十三日是唱大戏、赶庙会的日子。除唱大戏以外，庙会中还有转灯会。转灯场里栽上360根扎好的灯把，挂上360盏素油灯。再扎好门前牌楼，安装好出入口的门匾，门边挂两盏宫灯，周边插满了彩旗，整个庙会张灯结彩，五彩旗迎风飘扬。每当鼓乐声响起，转灯开始。人们得依照规定的排列顺序，按指定路线走。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转不出来。

夜幕降临，灯光更显明亮。花灯各有名称，有人形容为“月光连春色，灯影照星光”，那真是一片光的场景，灯的海洋。再加上彩旗招展，鞭炮轰鸣，锣鼓喧天，戏曲悠扬，气氛热烈，人心激动，欢声笑语群情激昂。常年劳作辛苦的人们，此时得到了尽情的释放。

1939年阴历五月十三日，是金鸡台村最后一次传统的庙会。当年秋后，日寇向金鸡台村进攻扫荡，将存放在北庵庙的各种戏曲设备和戏装道具全部抢走，不能带走的尽数烧毁。



更重要的是将底下庙老君观正殿顶层的各朝代古藏书卷全部掠走，还将护庙打罄敲钟的大振祥杀害，另一人侥幸逃脱。

（讲述人：董永和）

军爱民鱼水一家亲

金鸡台村自从来了八路军，老百姓好像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人。就是自家的亲人也有耍性发脾气的时候，而八路军的首长们经常到老百姓家访贫问苦。战士们为老乡跳水拾柴，还帮助孤寡老人们打扫卫生修房垒墙，同时帮助村里人治疗疾病，简直比亲人还亲，特别是和国民党军队相比，老百姓真正认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才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八路军里面好多战士还会纺纱织布。他们让村里的木匠做成小纺车，教会年轻的妇女们纺棉纱织小布。很快，党组织通过地下交通站运来了棉花，妇女们起早睡晚，嗡嗡地摇动纺车，然后把纺成的棉线织成面宽一尺的棉布。虽然显得粗糙了些，但是这简单实用的方法，解决了子弟兵穿鞋穿袜子的大问题。

山里人自己会纺线织布，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事。织出一尺宽的布面，正好够一双鞋面或一双鞋底的料子。剪裁下来的布尖还可以用来刮布革板用。八路军怎么这么多能人呢？在战士们的帮助指导下，山里人学会了很多新的技术，操持生活过日子，更有了好多新的办法。其实，山里人根本不笨，只不过以前见识少。要不，怎么共产党和八路军一来，就学什么会什么。



村里的能人张治珍，此时发挥了心灵手巧的作用。他本来就会木匠、铁匠、银匠、绳匠、皮匠、席匠、泥瓦匠能干的活儿，还会铸造火铳土枪，配制炸药。村里的民兵用他做的土地雷炸死了日本鬼子的大洋马。在八路军面前，这下他更开了眼。他按照部队要求做的小纺车着实灵便好用。本来就会把麻匹打成绳子，这和用棉花纺线是一个道理。所以他很快就成了纺纱的师傅。而且还发明了木板夹鞋底，也就是做一个架子，用两块木板把要纳的鞋底夹住，然后双手同时用两个锥子扎眼，再用两根针穿上细麻绳从两边同时纳针脚。他纳鞋底不但速度快而且针脚更匀称、更结实，还经常获得奖励。当时的奖品是一条新毛巾，现在看来虽然不算什么，但是在当年，能用得起毛巾的人家少之又少，这是多么大的荣誉啊！

村里先是邓华政委和宋时轮司令员来住过，后来萧克司令员也带着司令部机关在村里住过。邓华政委和萧克司令员住先后在张广人家的院里。当时民兵队长、儿童团长、妇联主任都要到他那里汇报工作，萧克待人和气着呢。

那时我很小，记得老七团的一个领导叫王启瑞，是大队长（营长）。和我家非常熟。八路军对小孩子特别亲热。为了防范大岭那边的鬼子，他带着一支队伍，住在杨家坨下面不远的山洞里。正好我家也在那里住。王启瑞大队长好几次带着我到他们驻扎的山洞里玩，晚了就和他们一起吃住。

那时部队晚上出去的时候，经常到大安山和庙庵梁去袭击鬼子，天快亮时回来休息。我娘为了让战士们休息好，主动和



王大队长说：“白天站岗的事就交给我吧，正好我连纳鞋底带监视敌人，让同志们休息好睡踏实。”后来，只要八路军战士们白天回来休息，我娘就拿着鞋底坐在前面小山头上做针线。那里很敞亮，能看清东安岭和庙鞍梁，只要有鬼子在远处的山上一露头，马上就能看见。

有一天我在山洞里和八路军叔叔们玩，到了晚上，部队没有出去，王启瑞队长让我在山洞里住下了。也不知什么时候了，我醒了，摸到了一支枪，就摆弄着玩。王启瑞队长听见了动静起来发现是我在摆弄枪，忙说：“小鬼，别动这玩意儿。这可不是玩的，是用来打鬼子的。”王启瑞队长把我抱起来，放回临时搭的土炕上睡觉，他就出去查岗了。

（讲述人：董春庆）



房山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第一

李书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中共北方局派汪之力、高鹏等中共党员到北平近郊开展抗日工作。同月，八路军总部派赖富、吴伟等12人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员胡敬一在青白口（位于门头沟）成立了平西游击支队。1937年10月，中共北方局派苏梅、陈群、陈仲山开辟抗日根据地。11月，中共河北省临时省委派胡景翼、刘杰等建立中共宛平县临时县委。1938年2月，晋察冀军分区第一支队政委邓华奉聂荣臻司令员命令，率独立师三团挺进平西，3月建立了3个县委和抗日民主县政府。在涞水县的马水村组建了中共房（山）涞（水）涿（县）联合县，在涿鹿县的谢家堡村建立了宣（化）涿（鹿）联合县，在宛平县的斋堂村建立了宛平县。至此，形成了以百花山为中心的平西周边抗日根据地。平西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战略要地，是北平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包括宛平、房山、良乡、涿县等12县的大部分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建立地方政

* 李书会：房山区档案馆副馆长



权和革命武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房山在抗战中形成的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第一”。

包森开辟房良抗日根据地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1911年7月出生在陕西蒲城县一个穷苦的农民家里。1932年2月经中共蒲城县委书记王培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入西安高中。由于组织学潮被捕入狱，在西安学联营救下获释。1933年秋，在西安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第二次被捕，十年监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获得释放。抗日战争开始，党派他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一师地方工作队。1938年2月，包森随邓华支队挺进平西，他以过人的胆识和谋略，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开辟了房山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房山第一支抗日队伍，建立房山第一个区级抗日政权。

1938年2月，奉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独立师政委邓华奉命率三团挺进平西。3月，原房良县和涞涿县合并组成房涞涿联合县，由杨春圃任县工委书记，刘慎之任县长，包森任游击支队长，并由三人组成中共房涞涿县工委会。

中共房涞涿联合县工委成立后，即决定派包森到房山县开辟根据地。包森以县大队队长和邓支队代表的身份，带一个小连，经峨峪、大安岭，到房山五区的大安山。



房山第一支人民抗日队伍

包森在南窖一带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多种方式，团结了姜时喆、王友梧、陈伯诚等十几名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通过演讲、讲课、写标语等方式积极宣传抗日方针和政策。他向群众反复宣讲了党中央的《关于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物出物，各尽其力、团结抗日，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包森还用在敌人监狱中刻苦磨炼出来的左手写字的本领，在大街小巷刷写很多抗日标语，深受群众欢迎，演讲口才也受到群众的称赞。

建设抗日根据地必须有武装力量作为后盾。包森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的同时，积极开展改编五区自卫团的工作。他和自卫团团总解景波等人连续谈判了4天，反复讲明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之际，必须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道理。自卫团团总在包森的说服和开导下，明晓大义，同意抗日。根据谈判协议，在班各庄召开自卫团改编大会，南窖、大安山、北峪等各村及五区自卫团成员150多人到会。包森在大会上宣布了将五区自卫团改编为房涞涿抗日游击支队的决定。

包森还做了原房山四区自卫团的争取工作。在东庄子村，包森找到原四区维持会会长殷耀东和四区自卫团团长郝洪如，耐心讲解抗日道理，说服二人同意抗日。在做好两个区的自卫



团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包森将两个自卫团的班长以上人员，集中到班各庄河滩开会，包森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共房涞涿抗日游击支队正式成立了！包森任支队长，姜时喆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设三个大队，陈伯诚任第一大队队长，郝洪如任第二大队队长，李兴任第三大队（特务队）队长。

包森将五区、四区自卫团改编为房涞涿抗日游击支队，这支队伍达到 400 多人，这是房山县人民自己的第一支抗日队伍。队伍成立后，包森曾带领他们到羊耳峪打过地方土匪，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和粮食，士气大振，抗日斗志更加高涨。

房山地区第一个区级抗日政权

没有政权，人民不能当家做主，军队也难以存在和发展。必须在军队保卫和掩护下，建立起人民的政权，抗日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于是，包森开始积极开展建立政权工作。

当时，在房山五区抗日根据地已经比较巩固，在这个地区建立人民自己的抗日政权，条件已经成熟。包森和姜时喆、王友梧等进步青年商议后，决定废除日伪的维持会，建立抗日救国会。经过多方面的酝酿和筹备，包森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宣布南窖地区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王友梧任救国会主任。救国会是人民自己的组织，它的任务是为人民做主，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房山五区区政府也相继在南窖成立，区长为罗化之，这是包森在房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区级抗日政权。



抗日救国会和房山五区区政府成立后，包森等人领导人民群众进一步深入开展抗日斗争，在五区建立了“民族抗日先锋队”，由姜时喆、傅伯英、陈伯诚三人负责，队员发展到百余人。他还到原房山四区河北村一带开展建政工作，发动群众，废除了日伪维持会，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房涞涿游击支队改编为平西游击四支队（即房良县大队），支队长贾嵩明，政委尚英，下设 3 个大队，共 400 多人，驻防在房良抗日前线。

包森在南窖地区建立抗日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向周围地区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使整个河套沟，下起磁家务村，上至堂上村，南起南窖村、北安村，北至大安山、北峪村，在 6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50 多个村庄里，燃起了熊熊抗日烈火，为以后建立房山、良乡联合县政府创造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流传着一首民歌：“五区，五区，人人都是抗日的……”

1938 年 4 月底，包森调离房山，6 月率 40 多人到冀东，在河北兴隆一带开辟抗日游击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冀东游击战争。1942 年 2 月 17 日，包森在遵化县一次战役中不幸胸部中弹牺牲，年仅 31 岁。

包森不仅是房山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早期开创者之一，还是整个冀东军区抗日战争的卓越领导者，他的名字镌刻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日英烈”纪念碑上，他的赫赫战功与英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房山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4月底，八路军五支队奉晋察冀边区命令，派杜伯华、郭方、尚英等人来到房山五区政府所在地南窖，进行建县的筹备工作。5月8日，在长操村召开了由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杜伯华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宣布：房良联合县政府成立。这是房山地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由郭方任县委书记，杜伯华任县长，傅伯英任宣传部部长，赵然任组织部部长，松伟任妇救会主任。县政府机构健全，分社民、财、实、教、粮五科，根据地下至河北、磁家务，上至大安山，辖29个村庄。同时，还成立了房良县抗日救国会，由郭方兼任主任。

房良联合县政府建立后，立即着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加强县区、村抗日政权建设。在初建时期，因党组织尚未公开，各项抗日工作多以县政府和救国会的名义下达，所辖29个村划为一个区并成立了救国会，由庄敬山任区长，蒋维屏任救国会主任，工作一直由区布置到村。在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一些领导同志纷纷深入乡村，着手基层的建党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根据地上自大安山、下至磁家务共39个村，纷纷建立起抗日政权，建立起了农会、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救国会和模范队等群众抗日组织。



各村抗日活动十分活跃，为基层建党工作创造了条件，使全县工作出现了崭新局面。随着基层建党工作的进行，党在农村普通群众中扎下根，房良地区的抗日工作也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房山地区第一个村级党支部

随着房山地区抗日斗争的开展，建立起了村级党支部。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房良联合县委员会建立后，党建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同年6月，经赵然介绍，霞云岭上石堡村进步青年于进琛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经赵然、于进琛介绍，上石堡村的王兴云、李甫贵、谢景申、郑修贤、王水、谢景河等6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组建了房山地区第一个村级党支部——上石堡村党支部。于进琛任党支部书记，谢景河任组织委员兼任农会副主任，王水任宣传委员。同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村里又组织了房良联合县最早的民兵中队。王兴云任民兵指导员兼村武委会主任，李甫贵任农会主任兼民兵中队长，谢警申任青年委员。这支民兵队伍，开始时只有10个人，后来逐渐发展到27人，在对敌斗争中，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多项任务。上石堡村成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沿地带。

上石堡村党支部成立后，积极带领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动员青年参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他们还成立了粮食借贷所救济穷人和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敌情等活动，上石堡村及周边地区



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房、涑、涿地区建立党支部播撒革命的火种开辟了先河。在上石堡村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上石堡也成为执行党的抗日主张最坚决、对敌斗争最顽强的村。

1940年房良联合县发生“一区事变”，上石堡村党支部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特务、汉奸告密，于进琛、李甫贵、谢景申、王兴云4名共产党员惨遭日本人杀害，党支部暂时停止工作。1941年3月，房良联合县九区组织委员王荣善，到该村恢复建立了党支部，谢景河任党支部书记，王水任党支部委员。以后又发展了王兴元、隗合宽、于进水等人入党。1943年5月，八路军军分区授予上石堡村“华北抗日模范村”的光荣称号。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上石堡村党支部一直都是先进党支部，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涌现出了一批如隗合宽等“华北抗日民兵战斗英雄”。到1949年全国解放，仅有400余口人的上石堡村就发展了中共党员60多名，约占总人口的15%，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房良地区第一所抗日高级小学

为了改变山区文化落后的状况，在经济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1939年夏，房良联合县政府在西庄村（距离县政府所在地十渡村一华里）创办了房良联合县抗日高级小学，这是房山



地区第一所抗日高级小学，第一期学员有 50 多人。县长刘介愚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并亲自为师生们讲授毛主席名著《论持久战》；县教育处（县委对外的名称，县委不公开）的赵然等领导同志到校给师生们讲授《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一宣言》等内容。

当时粮食紧张、食盐很难买到，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窝头、玉米粥，但全体师生革命热情很高，干劲很足，没有一人叫苦。为躲避日军和汉奸队对根据地的“扫荡”和飞机轰炸，保障师生安全，在学校操场附近的树林中挖了许多防空洞。每当听到空袭警报，师生就有秩序地进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后，师生们再出来进行学习。

1939 年冬，抗日高小搬到马安村，著名爱国人士、“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到该校视察并发表演说。李公朴不仅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做得好，是模范根据地之一，而且还称赞抗日高小办得好，为国家培养了人才。

学校大体上是一半天学政治、文化，半天做社会工作。师生走出校门，到各村办识字班，学唱救亡歌曲、排演抗日救国的歌剧、话剧，到山区的浦洼、霞云岭和平原区的南白岱、惠南庄一带演出，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学校为房良地区培养了抗日骨干。

1940 年 5 月，第一期抗日高小学生提前毕业，分配了工作。年龄大的同学参军或参加政府工作；年龄小的同学组成房良青年工作团，在戈枫同志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房涑涑第一个抗日模范村

1940年秋季，日军采取“分进合击、梳篦清剿”的战术，向平西根据地进行疯狂的秋季“大扫荡”。马安村提前做好坚壁清野工作，将十余万斤粮食掩埋起来，把文件藏进地洞里，把伤病员转移到山上。日军进村扫荡后，什么也没有搜出来。

“一区事变”后，日军在马安东山头上设置据点，直接监视马安村。1941年8月中旬，日军开始所谓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岗村宁次调集在华北的6个精锐师团、5个混成旅团及部分伪军10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与平西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沿拒马河谷推进的日军所到之处，烽烟四起，无恶不作，在各村烧杀抢劫，进到涑水蓬头返回，到房涑涑联合县十渡一带，在西庄和王老铺两村建立临时据点，在十渡、六渡留兵驻守，妄图长期盘踞，大部队则顺拒马河谷返回。

驻西庄据点的日军派汉奸到附近各村送信，要求各村送钱送粮送民夫，并威胁恐吓，如若不送就杀个鸡犬不留。马安村党支部书记刘显斌、村长刘德忠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全体党员、群众一致表示，宁可让日军进村洗劫，也不当日本侵略者的“顺民”，要抗战到底，绝不资敌投敌。马安村党支部做出了周密安排，组织群众做好坚壁清野、转移伤病员，在村口、山头设置岗哨，一有动静就鸣锣为号立即组织群众撤离上山。



日军在发出信后的第三天直扑马安村，结果扑了空，既抓不到人，又抢不到粮，气急败坏放火烧毁了 478 间房屋，残忍杀害了 13 名来不及撤走的群众。

马安村未向日军上缴一粒粮食，马安村人民也没有被日军吓倒。按照上级指示，马安村民兵组织上山开展游击战，他们凭简单火力，拔掉了日军在东山上的炮楼。

1941 年秋天，房涞涿联合县政府在十渡西庄村口的龙王庙（现平西烈士陵园）召开授奖大会，县长王天瑞亲自将绣着“抗日模范村”的锦旗交给了马安村代理村长刘占臣，以表彰马安村在反扫荡中机智勇敢、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这是平西的第一个抗日模范村。

1951 年 8 月，中央人民政府赴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代表中央政府和毛主席赴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分为晋冀鲁豫、晋察冀和晋绥三个访问团。访问团携带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题字 10 万份、毛泽东主席金质奖章 3 万个、慰问信 15 万封，赠送给根据地的人民、功臣、烈属和模范。访问团将印有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字的锦旗再一次颁发给马安村。马安村人民因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的精神，又一次获得了这份荣誉。

抗日战争时期，房山地区位于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沿，是平西抗日根据地插在华北敌后的一把尖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的革命先辈和房山儿女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既有包森、赵然等抗日先驱，也有上



石堡村、马安村等著名的抗日模范村，还有许多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革命先烈，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了这几个“第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许多英勇顽强的感人事迹和鲜为人知的壮烈场景，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红色粮仓

姜玉央*

京西大石河的中上游，多狭窄的山谷。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深山峡谷之中，荫庇着“红色粮仓”。

房山区佛子庄乡的石板房、大港和五道河，当年均建有“红色粮仓”。1942年，平西的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阶段，由于日寇的封锁，根据地粮食短缺，八路军战士行军打仗时常断粮，粮食和



石板房村的磨石台

粮道成了八路军的生命线。为了突破日寇的封锁，上级派八路军战士、共产党员史明楼潜回他的家乡石板房筹措军粮，建立粮仓，开辟粮道，被乡亲们尊称为“粮秣”，并当选为民兵连长。

石板房村地处深山峡谷之中，在大石河北侧，距大石河有4公里之遥，由三个小自然村组成：石板房、梨树台、磨石台。

* 姜玉央：房山区佛子庄乡中心幼儿园教师



磨石台最远、最偏僻，也是史明楼的出生地。他选择这里建了八路军的粮仓，开始筹措军粮及战备物资。



红色粮仓遗址

粮仓就建在磨石台前的空地上，是三个直径七八米的圆墩子，最高可达十米，

用山上的石头筑基，荆条编制，顶部盖有山草和雨布，外部抹泥，挡雨防潮。当年存有玉米、谷子、黑豆等粮食，都是由民兵和当地百姓及爱国人士从山外秘密运进来的。有时运来的粮食太多，原有的粮仓装不下，史明楼就腾出家里的两间房做粮库，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住。骡马运粮时，临近磨石台要过一道河，常年流水，冬天结冰，曾多次摔伤牲口和行人，聪明的石板房人，在河面结冰时，割来大量山草，铺在冰面上，远远望去就像一座桥梁，故得名“草桥”。

当年通往根据地的红色粮道是由大港、磨石台出发，沿崎岖的山路，先到鸳鸯水，再到史家营，然后翻山越岭，最后到门头沟的斋堂，最远可达河北省涿鹿的矾山。

“粮道”不但运送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还护送了大批的军政干部和来自北平的进步学生。运粮食的人基本上用的是民兵和当地的扛工，以毛驴驮运为主，行程大概五六天。一般在出发之前才告知赶毛驴的把式，目的地是哪，必须保守秘密。如果中途毛驴身体出了问题，民兵队员就要身背肩扛，负重一百



多斤，走上几十里山路，跟牲畜比体力，把粮食送到目的地，往往人累得趴在地上起不来，但他们无怨无悔，为民族的解放做着极大的牺牲。

村里的民兵在史明楼的指挥下，曾在草桥下游的峡谷地带，居高临下，用乱石阻击过前来搜山的日军。史明楼命令民兵队员：“决不让鬼子接近草桥，一定保护好粮仓！”



战场遗址

之后，鬼子多次派飞机在大港和石板房一带盘旋侦察，终没有发现粮仓。

在战争年代，石板房、大港和五道河的乡亲们舍命与鬼子、汉奸、特务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保护着红色粮仓。1950年，朝鲜战争刚打响时，上级政府征集驼队，把粮仓存的二十万斤粮食运出深山峡谷，送往前线，支援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人民群众用血汗铺就了“红色粮道”，确保了军政机关和部队有充足的粮食。现在，“红色粮仓”仅存遗址，难寻遗迹，但石板房、大港和五道河的乡亲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抒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将永垂青史。



平津战役中的良乡

原启长*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包围平津国民党守军。

这年华北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南面华北野战军分别解放了石家庄、保定及周边各县城；西边杨罗耿兵团解放了张家口、宣化、在新保安歼灭了傅作义王牌 35 军；北面东北四野越过长城，解放了密云、昌平。几路大军分别包围平津傅作义国民党军队，切断西逃、南撤的道路。傅作义举棋不定时，1949 年 1 月 15 日，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天津，堵死了从海上南撤的退路。

北平守敌被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在北平城内，逃和撤都堵死了。房山的敌军也被华北野战军与房良独立团于 1948 年 12 月 12 日包围。华北野战军送信给守敌，命守敌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敌人拒绝了。华北野战军的大炮一阵猛轰，打得敌人狼狈逃窜。12 月 13 日连夜逃出房山县城。1948 年 12 月 14 日，华北野战军与房良独立团攻入房山县城。房山县城从此解放了。

* 原启长：华润紫竹药业原员工



1948年12月14日，良乡县委书记霍梁接到上级通知，必须于12月15日赶到良乡。12月14日，霍梁书记带领县委、公安局及县委其他人员从中共良乡县政府所在地班各庄出发，徒步沿着河套日夜兼程，于15日天亮时赶到了良乡。

此时解放军已占领良乡，良乡的敌人都跑了。县委书记霍梁带领县公安局同志来到良乡县，接管了良乡县警察局。当时警察局长与大部分警察早跑了，留下一个督察长和一个房山县撤到良乡的坨里分局长。他们进院时，警察局仓库还冒着烟，留下一些没烧完的文件与不能带走的物资。大家进院赶紧把火扑灭，霍书记命那个分局长召集留下的警察开会。霍书记向他们宣布：“良乡解放了，你们要戴罪立功。”当时由王士才同志负责公安局的工作，大家摘下了良乡县警察局的牌子，由王士才同志亲自写了一块“良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的牌子挂了上去。

良乡解放后，全县城进行户口清查。在清查的过程中，利用旧警察搞调查，清查户口，对摸清人口状况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良乡有车站，有铁路工厂，还有国民党特务、三青团、敌伪人员，人员很复杂。因为这些旧警察基本是当地人，许多就是良乡本地人，非常熟悉情况。通过清查，对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进行了登记，对其中一些主要分子进行了关押。

良乡火车站的铁路工人组成了工人纠察队，铁路工厂组织了护厂队，车站与县城设哨兵。1948年12月21日，一列火车开进良乡，由彭真同志率领的北平市委、市政府军管会、市公



安局的同志们来到了良乡。他们从西柏坡出发，在保定进行了几天的学习，充实了干部队伍。

1948年12月25日，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在良乡吕祖庙，给全体干部作报告，提出了进城以后，将彻底摧毁肃清反动势力的残余。会后向大家分发了《入城初期的工作计划》。由市委军管会、市公安局统筹安排肃清特务，维护社会治安三项工作。

1949年1月15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北平守敌已成瓮中之鳖。

1949年1月22日，北平市委在良乡驻扎近30天后，开始启程进北平。这天早晨，良乡城外停了十几辆大卡车，还有几辆吉普车。临近中午，彭真同志带领市委、市公安局的同志登上了汽车。此时现场欢送的人们依依不舍。县委书记代表良乡人民与彭真同志话别。

汽车开动了，人们招手目送车队远去。汽车朝着长辛店方向驶去。后经过三家店（河西过河）、石景山发电厂，到达海淀。市委驻海淀镇，军管会驻颐和园。1月31日，他们从西直门入城，完成了接管北平的任务。



罪行累累的坨里炮楼群

刘树懋*

大石河是房山的母亲河，她发源于房山西北部霞云岭和史家营西乡的崇山峻岭中。从发源地出来后就在高山峡谷和纵横沟壑中蜿蜒前行，中途又汇集了多条支流，在左冲右突中跋涉约 200 里许，在坨里以里的口头山和辛开口大寨山之间流出山地奔向平原。口头山和大寨山如两扇大门，把山区和平原截然分开。从南部平原延伸过来的土石马路从坨里村西的大石河滩经过，没走多远，就从两扇大门中间穿过，顺着大石河，在冬春有桥、夏秋淌水，河石滚滚的河谷中溯流而上 20 公里许，就到了河北村。这里是地区的中心区。可能历史上因为与房山西南的张坊沟相区别，把这块地方称为河北沟，又因大石河河谷有众多自然形成的多姿多彩的河套，这块地方又称河套沟。因为地区内山高谷深地形复杂，物产丰富，临近京畿，又有顺大石河河谷而行的重要通道，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坨里村正好位于河套沟的唯一出入口不远处大石河的东

* 刘树懋：房山区商委原助理调研员



岸。村子北部东部是高低起伏的丘陵区，地势较高。西北距口头山及辛开口大寨山的出入口仅里许。路就从村子脚下的大石河河滩经过。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认识到坨里村重要的地理位置，把这里作为进攻平西的战略要地和重要据点，从这里进入河北沟，在里面建立了好几个据点。我党的抗日武装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较早地深入到这里，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军认识到这个村的战略地位，迅速派兵占领了这个村，利用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步把这里建成了罪恶累累的反动堡垒。

他们根据当时水泥钢筋等物资难以搞到的情况，向当地及附近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征钱征物征民工。强迫民工到大石河和就近的山坡刨石头，让附近的石灰窑为他们烧石灰，强迫民工用石头和石灰垒地基，驱使民工用黄土打坯垒墙。用强砍来的树木做柁檩，在村子附近重要的山坡头上建炮楼和碉堡，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前共建起十个炮楼和难以计数的碉堡，使坨里村附近炮楼如林，碉堡遍布，在这些设施里配备了各种武器，使村西大石河和村子几公里范围都在其严密控制内。使坨里村附近成为一个顽固的反动堡垒。

为了使这些炮楼和碉堡发挥反动作用，他们千方百计收罗各种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即有所谓正规军，也有杂七杂八的地方武装，在水峪村的杨家坡、曹家坡、风坡岭三个炮楼是河北省十二团的一个连守卫。在娘娘庙附近的一个炮楼是房山



县大队驻守，大队长叫尤茂芝，他既镇守这个炮楼，还是八个炮楼的指挥官，司令部就设在娘娘庙。坨里南部小山坡上的炮楼，是房山二大队驻守，大队长是李金生。在大石河孟家湾上面的三个炮楼，由赵连海的十三大队管辖，十三大队又叫坨里乡。坨里以北石梯村的两个炮楼归八大队管，八大队又称河南乡，大队长是段培德，他也是河南乡乡长，河南乡外号流亡乡，其人员多是解放区范围的河南村附近跑出来的地主、富农等。

国民党反动势力把坨里这个顽固的反动堡垒作为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和进行封锁的重要基地，对解放区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因为坨里村控制了河北沟解放区的唯一出入口，如果利用这里有利地形，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封锁容易。当时驻守这里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一次次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他们有时进攻到磁家务一带，有时还深入河北及李各庄村一带。所到之处见到游击队就抓就杀。所到之处把牲畜赶走，把猪鸡抓走，把粮食抢走，把当地洗劫一空。在一次的进攻中残杀了十几名游击队和群众，罪行令人发指。为了给解放区制造困难，妄想困死解放区，利用坨里这个唯一的出入口，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进行了严密封锁，一切物资不许进入解放区，不仅粮食，衣物、铁器决不允许进入，连纸张、墨水、火柴、点灯的煤油等也严格卡死不许进入。谁违反轻则毒打、蹲黑屋，重则杀掉。

国民党反动势力盘踞了这里，利用手中的武装害如匪患，作孽一方。驻守坨里炮楼、碉堡的国民党军队，由各种武装分子拼凑而成，与土匪相似作孽一方，他们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



杀人抓人。这么多的炮楼碉堡，工程浩大，全是强征的民工无代价的劳动建成。我哥哥在那时还只十二三岁，每隔一天就必须扛着铁锹跟其他大人一起到坨里去修炮楼。我家同院的一名青年就是因为受不了国民党的打骂跑到丰台参加了傅作义军队，和平改编后成了志愿军，后来牺牲在朝鲜战场。那时坨里归房山县管。我家吴庄的东半村归房山县管，西半村归良乡县管。房山的和坨里的国民党军队常到我们村来，来了就强迫各家为他们蒸馒头烙饼。他们还闻到哪家飘出香味，就去哪家吃喝。当时人们把他们叫闻香队。除了吃喝还四处抓鸡赶猪。因此，只要发现他们要来，村里人就抱着鸡赶上猪到村外大沟里躲藏。我和哥哥就有这样的经历。

国民党在坨里修的炮楼和碉堡群，在一次战斗中，游击队一下子占领了不少，被一把大火烧掉。余下的炮楼和碉堡在解放后不久就被全部拆掉了。